

“明道”与“修德”并行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价值

凌 均 卫

(南华大学 老科协,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通过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两大主要流派儒家与道家学说的研习可见,“道”与“德”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两个核心概念,“明道”与“修德”贯穿于中华文明演进的全过程。“明道”偏重于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修德”偏重于对主观世界的完善,这种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有机融合的内在认知思维逻辑,又以“明道”与“修德”并重为社会实践的行为逻辑,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也是突出的优势。将“尊道”与“贵德”并重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融汇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华传统文化; “明道”; “修德”; 内在逻辑; 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2-0047-06

人类文明是由人来创造的。人在创造人类文明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不断地认识与人化客观世界,同时要不断地认识与完善主观世界。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数千年之前就提出了明客观世界之道、修主观世界之德的明确观点:“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易经·系辞上》)“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经·说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经·道生之章》)此类论述,或偏重于“明道”,或偏重于“修德”,或合一而论,或隐或显,贯穿遍及于儒道两家的经典著作之中。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华先圣们既重视认识客观世界,强调“仰观”、“俯察”而知天地之“幽明”,又重视修炼主观世界,强调“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慎其独”、“尊道而贵德”。无疑,这是抓住了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关键,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与认识主观世界最伟大的原创性思想成果之一。正是在这一思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在明道与修德的实践中,数千年辛勤耕耘,不懈探索,既百家争鸣、交相辉映、又推陈出新、延绵不断,创造了中华文明的灿

烂辉煌,源远流长,至今光焰不减。

在中华文化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诸子百家,万千名人。然就其思想学说来讲,最主要的是孔孟与老庄两家。孔孟学说谓之儒家,老庄学说谓之道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对道与德的认识与力行上有分野,但儒、道两大学派均以“道”与“德”为其思想内核。从老庄学说的代表作《道德经》、《庄子》及其历史影响,足见其思想内核是道与德;在儒家学派那里,我们虽不见对道与德概念如道家那样作直接阐释,但从他们的论著及其历史影响、学理归因分析,我们也不难认定,其思想内核也是“道”与“德”。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道与德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两大核心概念,“尊道”与“贵德”是中华文明价值的精髓与灵魂,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

从实践过程看,人类经验知识积累的途径及对世界(包括人自身)认知的理论升华发展阶段,大体上是一致的。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差异,认知的“自觉性”与“成熟期”则或迟或早。中华文明无疑是早熟的,这种早熟就体现在数千年之前就有了明客观世界之道、修主观世界之德的明确意识。很显然,这种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高度统一、有机融合的内在认知思维逻辑,又将“明道”与“修德”并重用于社会实践的行

[收稿日期] 2015-12-29

[基金项目] 南华大学2015年社科基金课题项目“中华之‘道’的现实解读及其意义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 凌均卫(194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老科协教授。

为逻辑,并进而将“明道”与“修德”升华到“尊道”与“贵德”,无疑是抓住了认识与人化世界的关键与根本。用现代观点看,“尊道”是科学精神的核心,“贵德”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感悟这一点,对我们认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与优势,增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对启迪我们今天的思想与作为,当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道”是中华传统自然观的核心概念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大自然这个外部世界。面对着浩瀚宇宙、苍茫大地、纷繁万象、莫测变化,人类从古时候起,就凭着仰思与俯想、直觉与窥探、猜测与向往,热情执着地观察并思索着外部世界。这种观察与思索经历过漫长的原始宗教和神话思维过程,才由于科技进步而逐渐发展到科学理性。

“中国文化和哲学无疑是早熟的,但是这不等于说它没有经过原始宗教、神话阶段,因为人类经验知识积累的途径及文化哲学发展阶段大体上是一致的,不管道路多么特殊,成熟期或迟或早,就其文化创造及思维发展所经历的最初阶段来说,是很难超越的。”^{[1]72}司马云杰先生详细论证了中华文化哲学从原始宗教、神话阶段、天帝观再到天道观的认识演进过程,论述了“中华之‘道’”这个中华文化哲学核心概念的源起、形成与发展历程^{[1]第2章}。他明确认为:“道的精神,大道哲学或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重建大道哲学,重建道体的形而上学,就是重建这种精神,就是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归复中华民族之魂。”^{[1]序言4-5}

要认定“道”是中华传统自然观的核心概念,还得从“道”究竟是什么,从道的本质内涵切入。我们可以从先圣论“道”与现代科学观两方面来简要阐释“道”的本质涵义。

最早明确提出“道”概念并探求其本质涵义的是老子。先人们“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易经·系辞上》)经过不断的认识积累与深化,2500多年前的老子,将这个“幽明之故”用一个“道”字来概括,并对其“名”与“义”作了反复深入的阐释。

老子《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者,万物之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

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从这些论述中可见,“道”是老子用来描述宇宙万事万物演化奥妙的“名”。道虽玄之又玄,却是人们认识“万物之奥”与“众妙”之“门”。在老子看来,“道”的存在是先于天地万物的,“道”的运行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天地人世间,有“道”、天、地、人四个伟大的存在,人是万物之灵,是人在认识与效法天地自然。这个天地自然的根本就是“道”。此后,“道”便成为探究客观事物本质与运变规律的核心概念,开启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悟道”、“明道”、“循道”的演进历程,形成了以“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特色。

在中国,“孔孟之道”、“天道酬勤”、“道济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可谓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道理、道德、道义、道路,天道、地道、人道、世道,正道、邪道、王道、霸道,等等名词概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时无刻不在涉及和运用。在这些词汇中,内核均在一个“道”字:“道理”者,意为循道才合理,合理必循道。“道路”者,意为循道才有路,路通必循道。“天道”者阴与阳;“地道”者,柔与刚;“人道”者,仁与义。总之,凡含道的词汇,人们都能明白或联想到一系列隐含于“道”之中的客观事理,

正如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所说:“‘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但‘道’的观念也是由轴心时代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庄子所共享。他们一致认为,‘道’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轴心时代创生的概念影响力日渐深远,特别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观念,几世纪来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这点看来,要说‘道’与历史组成中国文明(注:原文为‘民’)的内在与外在也不为过。”^[2]在余英时先生看来,孔子思想和“道”的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远弗届”)。是“道”与历史构成中华文明的“内在与外在”。

“道”涵义的真理性,可以从现今科学观与认识论得到印证:现今科学观与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所有认识活动,不外乎在探“万物之性”,究“万事之理”,察“万变之律则”。“道”既涵盖了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也涵盖了万变之律则,亦即:“万物”、“万事”、“万变”皆各有其“道”。人们

探究宇宙世界的奥妙,就是要“悟其道”,而后“明其道”,然后再“循道而行”。因此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实乃“悟道”、“明道”、“循道”之历程。《易经》即是探究万事、万物、万变之道的学术经典,是古代圣人“悟道”、“明道”、“循道”认知思维与实践经验的结晶^[5]。

由于“万物”、“万事”、“万变”皆各有其“道”,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类别的事物去悟道、明道时,对道则有不同的认知和表达。以儒、道、法三大家为例:儒家思想主要从认识人及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故以人伦之道为主旨。儒家经典与儒学文献浩如烟海,通观之,不外乎阐释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其中又以阐释人之为人之处世之道为重点;道家主要从认识天地自然的奥妙出发,故以天地自然之道为主旨。强调顺其自然不妄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之道,名副其实,更直接偏重于对“道”作哲理上的阐释;法家主要从认识社会运行与治理规律出发,故以治世之道为主旨。认定人有“就利避害”的本性,主张“定分止争”、“兴功惧暴”,实行严格的“依法治国”。凡举诸子百家,皆各有其主旨之道,是从某一层面或某种视角,阐释其对自然法则或社会生活实践的认知和主张。

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之“道”,其科学内涵的实质,就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道”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即人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循道而行才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定,“道”是中华传统自然观的核心概念,“尊道”是科学精神的核心。

二 “德”是中华传统人伦观的核心概念

在以人为主宰的这个世界上,人自身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社会,如何对待天地自然,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探问与思考这些问题。实质上,这是一个人类在认识与人化客观世界的同时,如何认识与完善人本身的问题。即人是什么?人如何做人(如何与客观世界相处)?回顾人类文明史,这一古老的哲学难题,数千年来,一直在思想界特别是哲学家的探索求解之中。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反映了这一探索求解的过程。将“德”作为人伦观的核心概念,无疑是中华文明早熟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

通观儒道两家经典我们知道,“道德”一词在中国古代并非一词,而是用“道”与“德”分别表述的。

中国古典哲学最经典、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道德经》,原名本为《老子》,前37章主要论述“道”,后44章则主要论述“德”,是名副其实的讲道论德之经典,所以,有的后人将其名为《道德经》。整篇著作五千余字中,并无“道德”出现,而是在深入论“道”的基础上,再阐释“德”,而且明确“德”是以“得道”为前提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3]意为凡大德所包含的内容,都是遵循于道、符合于道的。这里,老子提出了“德”的内容是由“道”的本质所决定的,说明了“道”与“德”的关系。老子认为,凡是符合“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凡是不符合“道”的行为,就是“失德”、“无德”。“道”和“德”是不可分离的,但又不是同一的。

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内涵中,基于老子道与德的紧密相关的思想,以至于后来常以“道德”合称。《道教义枢·道德义》讲:“道德一体,而具二义,一而不二,二而不一。”说的是,道与德本是一个整体,德以道为本,道显于德之中,循道方有德,有德者必循道。道是客观世界的本性、规律与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德的依据和评价标准。

在老子看来,“德”是人认知、把握并依循“道”所达到的境界。对于“道”的认识修养有得于己,称之为“德”。对此,老子在《道德经》第51章中作了深刻的阐释:“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一说为‘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里,老子认为,“道”生长万物,而“德”则养育爱护万物,但“道”和“德”都是“无为”而作的,并不干涉万物的繁衍生息,而是顺其自然。老子还认为,“道”生养主宰万物,又不据万物为己有,也不因为生养万物有功而自居,且从不干涉万物的自然生长,这是最深远最高尚的无私之“德”。由“道生之,德畜之”,“道之尊,德之贵”,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深涵的客观世界之“道”与主观世界之“德”的关系:生物者道也,养物者德也。自然万物之发生起于道,它有自身的规律与法则,人们只能尊重,不能违背;人对自然万物只能关爱、培育、保护,而不可肆意干预、糟践、弱待。老子把做到对自然万物“不有”、“不恃”、“不宰”的境界,看成是人的最高之德,即“玄德”。揭示出客观世界之“道”与主观世界之“德”两者之间的自然辩证关系,强调“尊道而贵德”为“万物莫不”,正是老子哲学的独到与精辟之处,可谓是老子思想的伟大所在。

以人伦之道为主旨的儒家学说,孔子秉承老子德以道为本的思想,始终把“循道”作为人的修身养性的根本。在儒家经典中,直接论德者虽不多,重点是以循道作为人之为人的规范来展开论述的,然其旨意仍在修德。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说过:“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4]他还说:“如果说君子之道属于人格论,那么中庸之道便属于方法论。”^{[5]109}儒家经典《论语》中,直接论“道”者 30 余处,直接论“君子”者 50 余处。从这些论说中,我们看到,孔子是以“循道”作为君子修德的基本标准:《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君子学道则爱人。”“君子之道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笃信好学,守死善道。”“道不同,不相为谋。”等等。显然,孔子的“君子之道”,讲的就是君子人格,就是君子应有的“德行”。

在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中,对“道”与“德”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论述得更更为详实,例如:“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5]107}这里,儒家将人之为入应当处理好的五大人际关系谓之“达道”,将应当为之力行的三个方面(知、仁、勇)谓之“达德”,认为“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中庸》通篇强调“君子遵道而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特别强调循中庸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因为中庸之道是让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并育生长之道,是最为重要、也最难遵循之道,故“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篇》)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德。

综上所述,“德”是中华传统人伦观的核心概念,“贵德”是人文精神的核心。

三 “尊道”与“贵德”是中华文明价值观的精髓与灵魂

由以上论述可以得知,“道德”一词与“道理”“道路”一样,复合着“道”与“德”的双重含义:“道”规范着“德”,“德”承载着“道”。道德境界的高低,标志着主客观协调一致的程度。人的发展过程,实乃通过“悟道”、“明道”、“循道”与“修业进德”的实

践活动,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不断完善对主观世界的修炼的过程,即不断升华“道德”境界的过程。

如前所述,“道”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即人的一切所做所为,都应当循道而行才是科学的、合理的,才能最终安身立命。故所谓“道理”、“道路”,都有其特定的涵义:“道”“理”合一,循道才合理,合理即循道,所以,为人处事都应当讲“道理”;“道”“路”合一,循道才有路,路通必循道,所以,人或事物要向前发展,都应当选择符合自身个性的“道路”。可见,汉语语境中的“道德”、“道理”、“道路”等等行为规范性词汇,都冠以“道”字,即人之所为都应循道而行。无疑,这些常用的重要词语,都深涵“尊道”的要义。

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典籍中,体现尊道与贵德价值内涵的随处可见。这里,先以儒家经典之首《大学》的论述为例来讨论。

《大学》开篇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亦作‘新’)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儒家提出了史称为君子修身的“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今天的观念来看,儒家所提出的“三纲”实质上就是人的世界观(真)、人生观(善)、价值观(美):“明明德”,阐明彰显天地之大德,可谓是世界观之真;“新民”,亲近百姓,爱之新之,可谓是人生观之善;“止于至善”,将“真”与“善”行于极至,当然是价值观之美了。

所提出的“八条目”,则非常明确而深刻地指出了明道与修德的规律与过程。前“四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主旨是“明道”:通过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研究考察(“格物”),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真知(“致知”),在对客观事物自然之道坚信无疑之后(“诚意”),方可有发自内心的、完全自觉的修业进德的心态(“正心”)。即唯有对“道”明透而诚心诚意“尊”之“循”之,才是自觉修德的基础;后“四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旨则在“修德”:修德先修身,而后才可依次齐家、治国、平天下。且“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对于人的修身养性,儒家强调从研究认识客观事物(“格物”)出发,以求真知(“致知”),而达到

对修身及对周围事物的“意诚”和“心正”的境界,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递进的实践目标。这里,既论证了明道与修德的关系,又阐释了明道与修德的实践过程。这些,都可见其朴素唯物主义和“经世致用”的思想光芒^[7]。

在儒家的人伦学说中,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人有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庶人、小人之分。依其“中庸”思维,在其人伦学理中,多以君子或士人作为人伦道德的标准,持守“君子之道”,是儒学人伦思想的核心。人之如何为人,多从君子之道展开。

关于君子之道的论述,可以说在中华文化典籍中比比皆是,这里,我们略举数例,窥其万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泰而不骄。”“君子学道则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要我们“意诚”“心正”,认真意会,就会看到,这些金玉良言,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恰恰可以从中找到当今诸多社会失范现象的原因。在中华历史上,凡“君子”主政,则国泰民安;凡“小人”得势,则国乱民苦。

人能“尊道”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显然认定,非“修德”终究不能“尊道”;道家则将“重积德”视为“长生久视之道”:老子《道德经·治人事天章》云:“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里,老子对“嗇”的概念作了特别的阐释。老子认为,“吝嗇”的原则,并非只是对财产金钱等的物质的爱惜,更多的是指要注重精神上精力上的积蓄养护,重视“德”的积累,蓄精养锐,培植力量,打牢根基(“是谓早服”,即早作准备)。在老子看来,精神上的“嗇”表现为对“德”的珍重与积累,积累越深,“德”越高尚,则没有什么不能胜任、不能战胜的(“无不克”);就有无法估量的巨大力量(“莫知其极”);这样就能达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生命长生久存的目的(“长生久视之道”)。

孔子、老子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们在2500多年前,就明确提出了“尊道”与“贵德”理念:既全面深刻地阐释了人之为人的应秉之“道理”,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应行之“道路”,可谓之“尊道”;又全

面深刻地阐释了将“循道”转化为“修德”的极端重要性和具体途径,可谓之“贵德”。回顾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演进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尊道”与“贵德”这样一条思想主线与实践路径。用现代观点看,“尊道”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即一切尊重自然规律与法则,敬畏天地自然之道;“贵德”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人有德,人正确,这个世界才会美好。“尊道”与“贵德”是中华文明价值观的精髓与灵魂。

四 将“尊道”与“贵德”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专题”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造成果传播出去。”可以认为,“尊道”与“贵德”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其与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可以相协调、相适应。

放眼今日之世界,人类面对的是一个问题很多、很大、很深的动荡不安的世界。归结起来,不外乎两大难题:一是自然环境持续恶化,人类正面临能否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二是普遍存在的争权夺利,以至于局部战争硝烟四起,黑恶涌动,对抗不止。科技的高度发展虽然为人们带来了诸多的福祉,但同时又面临高科技武器杀伤甚至毁灭的威胁;网络犯罪频发,高科技毒品泛滥,食品药品安全危害不断。可谓“人心不古”,引发严重的人心不安。

剖析两大难题产生的根源,探寻化解难题的方略与途径,已成为当今人们忧患与关注的热点,成为时政议论的中心。

笔者深切地认为,如若“心诚”“意正”地认识与理解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尊道”与“贵德”的价值观,从中可以找到导致两大难题产生的根源,不是别的,都是人类自身。前者失之在“尊道”,即科学精神的偏颇;后者失之在“贵德”,即人文精神的缺失。

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严格遵循天地自然的本性及其运行规律与法则,即“尊道”,而非唯科技至上的科学主义;什么是真正的人文精神?真正的人文精神是诚心关爱天下所有的人与自然界所有的生命,即“贵德”,而非只关爱

一国一族一集团和符合己意的人与生命,更非打着自由、民主的幌子,为一国一族一集团之私利,强行排除异己的“霸权主义”。

难题能否化解?如何化解?答案当是有的:人是时代的主宰,人正确,这个世界才会好。当今时代,特别需要有一个精准的“伦理罗盘”来指引,将人们由“聪明”引向“明智”^[8]。明智者,必是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和把握主观世界的人。若人们都能以“尊道”与“贵德”为价值取向,这个世界当有可能和谐与安宁。由此可见,重拾与弘扬“尊道”与“贵德”并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司马云杰.大道运行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社,2004.

[2] 余因时.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思[R].在美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2006-12-15.

[3] 凌均卫.“道”与“行大道”之解读[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46-51.

[4] 文选德.道德经诠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113.

[5] 余秋雨.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M].长沙:岳麓书社,2011.

[6] 陈戌国.四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10.

[7] 刘荣.王阳明“格物”“致知”说分疏[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68-73

[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

“Enlightenment of Knowledge” and “Cultivation of Virtue”

——The inherent logic and core value in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and culture

LING Jun-we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two main schools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reveals that “knowledge” and “virtue” are two core concep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and culture. “Enlightenment of knowledge” and “cultivation of virtue”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nlightenment of knowledge” focuses on the cognition of the objective world, while “cultivation of virtue” focus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ubjective world; The inner cognitive logic of thinking about the organic fusion of the subjective world and objective world, combined with the behavior logic of social practice focusing equally on “enlightenment of knowledge” and “cultivation of virtue”, i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inent advantage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and culture. It has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gene of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respecting truth” and “valuing virtue” in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nlightenment of knowledge”; “cultivation of virtue”; internal logic; core values